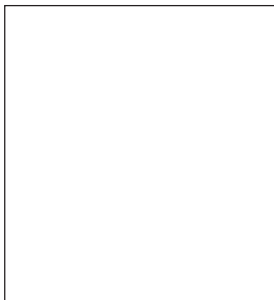


但已無法活化基因轉錄。原因是IE2含有一個轉錄抑制區，能抑制p53下游基因的轉錄。這個發現，提供了一個分子作用機制，來解釋巨細胞病毒致癌的可能性。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p53的故事。從過去18年來對p53的研究，我們更深刻的瞭解到，即使到了20世紀末，科學家仍有誤入歧途的可能。所幸，科學領域裡不同學門間的網狀聯結關係，再加上科學家本著追根究底的精神，勇於破舊立新，不斷矯正過去的謬誤，終能保證迷途不會太久或太遠。如同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思想家G. Bruno所指出的：「真理只有一個，也許當時隱晦不明，最後必定會顯現出來。」p53的例子，正是這句話最好的佐證。



林陽生

學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
學士(1979)

哈佛大學生化及分子

生物學博士(1984-90)

麻州大學醫學中心分子醫學所博士後研究(1990-92)

臺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副教授(1992-迄今)

本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992-迄今)

簡介「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 及「族群同化與動員」二文

王甫昌

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過去十幾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經歷了四十

多年以來所未有的政治變遷。而在此一鉅變的過程中，和省籍區分有關的族群議題，經常成爲社會大眾關心的焦點，它們也每每在選舉期間的成爲政黨或候選人重要的政治動員訴求之一。在台灣社會中過去省籍族群的文化差異逐漸泯滅之際，族群議題和政治現象持續的糾結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不易理解的現象。過去七年以來，本人的主要研究興趣便一直圍繞在解釋此一現象的相關課題上。此次本人獲獎的兩篇著作，主要便是針對台灣的省籍族群關係和過去十年來的政治變遷之間的關聯，在不同分析層次所進行的理論性及經驗性探究。以下分別介紹兩篇文的要點。

在〈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一文中，本人嘗試在鉅視的分析層次，以「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的概念，來解釋台灣反對運動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及一九八〇年代中葉以後兩次運動發展的高峰，在動員成果上的差異。所謂的「共識動員」，是指社會運動組織爭取民眾支持其觀點的過程。共識動員概念的運用，使我們將對於政治變遷的解釋，由過去一般研究比較強調的「政治精英之間的互動過程」的分析焦點，轉移到解釋民眾爲何改變其政治支持的對象，以及政治人物或組織如何說服一般民眾接受其政治觀點或立場。它強調的是政治精英、民眾、及外在政治環境之間的互動過程，包括精英如何企圖影響民眾、民眾爲何或如何接受新的政治觀點、以及政治環境或過去的歷史經驗如何影響精英對民眾的說服過程。文中所提出的影響共識動員成敗的因素，包括：1)運動意識形態的內容能否和民眾的歷史記憶或社會生活經驗形成共鳴；2)是否有外在突發事件的配合運動組織所宣揚的意

識形態；3)事件發生時是否已有運動組織基礎的存在；及4)共識動員宣揚進行的方式（辦異議雜誌或舉行群眾演講活動）等理論性假設。本文指出，台灣反對運動在兩次挑戰風潮中，在面臨不同的政治環境所提供的挑戰機會之狀況下，所採用的共識動員，在內容及策略上的差異，是導致兩個時期運動發展成效差異的主要原因。

一九五〇年政府遷台以後，國民黨以「動員戡亂時期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合法化台灣政治權力結構安排的基礎。由於為了維持暫時遷台的政府在動員戡亂時期中國法統的需要，國民黨透過實施戒嚴、凍結國會的全面改選、及限制人民部份政治權利的措施，創造了一個既合乎民主要求、同時又具有省籍不平等意涵的政治結構，長期以來即引發了本土性的反對運動的挑戰。反對運動於一九七〇年代中葉以後，在外在國際局勢的變化（退出聯合國、與邦交國陸續斷交等外交上的挫敗事件）所提供的政治機會中，以「民主化」的主要訴求，發起第一次較有組織的挑戰風潮。不過，由於缺乏已經存在的運動組織，執政當局也不容許異議者以公開演講的方式，去宣揚這些挑戰性的意識形態對於台灣政治情勢的替代性解釋，因此，其共識動員的成效相當有限。一般民眾的想法並沒有立即隨著這些國際局勢的變化而改變。在這種狀況下，反對運動「民主化」的主要訴求，並不能有效的抗衡國民黨當時仍然具有相當合法性的「動員戡亂時期」意識形態。加上國民黨強力宣傳中共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及中南半島幾個民主國家淪入共黨手中的事件，許多民眾仍然接受動員戡亂時期中國民族主義的想法，而認為在國家危難時期講求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政治權利，將

帶來社會的動亂，危及全體人民及國家民族的利益。因而在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之後，反對精英大量受到逮捕及判刑入獄的事件，並沒有受到太多民眾的反對，也使得反對運動在爭取民眾的支持上受到暫時的挫敗。

然而，美麗島事件的挫折，也造成一九八〇年代上半葉反對運動內部，產生了挑戰路線及方式的辯論與競爭。反對運動在共識動員的內容及策略上，也發生重大的轉變。在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前後，由於國民黨「動員戡亂」的意識形態，漸漸因為外在局勢的變化而失去其合法性、反對運動也漸漸形成比較完整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去對抗「中國民族主義」、並建立起相當的組織基礎、而且能夠以群眾活動的方式宣揚這些理念，乃造成了第二次挑戰風潮的發展。首先，由於「反攻大陸」逐漸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實施戒嚴及國會長期不改選也越來越難合理化，加上一九八〇年代上半葉國內外的政治事件，提供了反對運動另一次爭取民眾支持其觀點的挑戰機會。其次，反對運動在此一時期也開始發展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其政治本土化訴求的基礎。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個人的犧牲在反對運動的詮釋下，和台灣民眾反抗外來政權的歷史形成連接，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英雄。最後，國民黨對於一九八〇年代台灣各地頻仍的自力救濟事件不敢鎮壓的做法，也使得民眾對於群眾運動比較不排斥，而反對運動得以在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後，以比較有效的群眾活動的方式進行共識動員。這些發展可以說是反對運動在共識動員的內容及策略上「激進化」的結果。若以選票的增加來說，它們有效的增加了反對運動在一般民眾之間的支持基礎。過去國民黨在台灣所創造的不平等的族群政治權

力結構、及國民黨對於反對運動的長期的鎮壓措施，都是造成激進派系的觀點及運動策略，在反對陣營中漸漸取得優勢的主要原因。

在〈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眾政黨支持之分析〉一文中，本人則由微視層次的資料，討論台灣省籍族群區分與政治變遷糾結的另一面向：所謂的省籍融合與本省人政治動員之間的關係。由於在一九九二年以前，絕大多數的外省籍民眾都在選舉中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而不支持反對運動，而本省籍民眾則有相當比例支持民進黨。這篇論文的研究問題因此是：本省籍民眾為何支持國民黨或支持民進黨？前一篇論文主要是分析反對運動對民眾進行共識動員的努力，本文則企圖進一步分析：這些運動的努力是否成功的吸引了其目標支持者？它吸引了那一種社會背景的本省籍民眾？為什麼？運用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進行分析後，本文發現，本省籍民眾之中，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國語較流利、與外省人通婚者，較可能支持國民黨。反之，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內婚者，比較可能支持民進黨。文中的重要結論是：過去執政黨強勢的族群同化政策之成效，明顯的增加了本省籍民眾支持國民黨的可能性，也降低本省籍民眾被反對運動族群動員訴求吸引的可能性。它因此呼應了前一篇論文的發現。

王甫昌

學經歷：

國立中興大學社會學

學士(1980)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社

會學碩士(1986)、博士(1989)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1989-92)

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1992-96)、社會學研究

所籌備處助研究員(1996)、副研究員(1996-迄今)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進修(1996-97，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第三十四屆出國進修人員)

什麼是中國人？ ——華夏邊緣的形成與變遷

王明珂

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前許多學者對於「什麼是民族」有一種看法：民族是有共同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人群。基於這種對民族的定義，許多考古與歷史學者由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中蒐尋語言、體質與文化特徵等材料，由相似與相異的類比中溯源，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種、語言與文化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六十年代末起，人類學族群現象與理論研究有革命性的發展；強調主觀認同（而非客觀特徵）與族群邊界（而非內涵）的族群定義，進而探索族群認同的工具性（利益）與根基性（情感）基礎。近年來我結合人類學族群理論與集體記憶理論，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嘗試解